

□ 刘尚恒 著

徽州 刻书 与藏书

广
陵
书
社

徽州刻書與藏



刘尚恒 著

圖

藏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刻书与藏书/刘尚恒著.—扬州:广陵书社,2003.11
ISBN 7-80694-026-X

I.徽... II.刘... III.①刻本—研究—徽州地区
②藏书—研究—徽州地区 IV.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023号

书 名	徽州刻书与藏书
著 者	刘尚恒
责任编辑	高小健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凤凰桥街24-6号 邮编 225002
	发行部电话(0514)7343427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运河西路215号 邮编 225003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印 数	2000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026-X/K·11
定 价	28.00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又历来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大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们互相交流和融合,共同组成了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中华民族大文化。

近几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探讨地域文化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是其研究成果的结晶和代表。在这套 18 卷本的丛书中,即包括徽州文化,它和齐鲁、三晋、吴越、巴蜀、台湾、西域、荆楚、燕赵、三秦、关东、岭南等文化并称于世。历史上的徽州,是属县为六、偏处一隅的弹丸之地,竟能与这些大省区的文化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充分表明其文化蕴涵是十分丰富多彩、深厚的。不仅如此,徽州文化中更深层次、更系统、更丰富的部分形成了徽学(又称徽州学),由广义的文化概念进入到学术领域,成为与久负盛名的敦煌学、藏学齐名的中国三大以地域命名的学科之一,并引起国内外学人的瞩目和潜心研究。然而地域文化也好,以地域命名的学科也好,都是在其特定的地域条件下产生的。所谓特定的地域条件,从根本上说,就是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这是产生地域文化和地域学科的土地。

刻书和藏书,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徽州文化中的双子星座。它们是怎样在徽州这一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和发展,并且形成特色的呢?这就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徽州的地理生态环境至少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高山四围,三水外出——地理上的封闭性。黄山盘踞西北,天目山屏障东南,海拔均在千米以上,山陵占去全土的十分之九,中间形成的盆地便是徽州人聚落生息之所。陆路进出,有昱岭、箬岭、逍遥岩、丛山关、新岭、羊栈岭、大洪岭、马金岭等关隘,鸟道羊栈,险阻天成。所幸水路东有新安江可达杭州,北有青弋江与长江相通,南有闽江与鄱阳湖相连,顺流而下较易,逆流而上为难,滩多水急,且受雨量影响较大。这样一个封闭的自然区内,到处是高山峻岭,交通梗塞,易守难攻,这就为避世和聚族而居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

第二,田不足耕,获不足食——耕作上的恶劣性。这里山陵盘亘,可耕地少得可怜,且土质红硬而不化,有雨则涝,无雨则旱,所谓“耕获三不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人要活命,一是外出经商,逐什一之利;二是学点百工技艺,补贴生活不足。这就促进了徽商的形成和百工的兴盛。

第三,山深林茂,物产丰饶——资源上的丰富性。像是老天有意安排:耕作恶劣,却赐予山区丰富的资源。这里盛产林木、茶果、山珍奇兽,既为外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又为百工技艺的发挥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

地理生态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人文环境起决定作用。相对封闭且又山青水秀的地理环境,便是避难遁世的好去处。东晋南渡、唐末黄巢起义以及北宋靖康之乱后,大批中原士人来到这里,带来人力、物力财富,促使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封闭的环境迫使徽州人聚族而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得以巩固加强;耕不养人而又山区物资丰富,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之民寄命于商”,以致形成了足迹遍及宇内的挟资雄厚的徽州商帮;百工人众,技艺必精,以致世代相传,名噪海内。同时,这里又是“朱子阙里”,是宋明理学的沃土,兴教倡儒之风盛行,人才辈出,被称为“东南邹鲁”。

徽州的刻书、藏书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刻书,这里有大量的理学家们的解经注史著述,有文人学士们的诗词歌赋文稿;遍设的学校、书院是广阔的图书市场所在;赚了钱的商人有刻书、藏书的雄厚资本;山区的优质硬木可作书版,精良的纸墨可供印刷,技艺精湛的刻工可使图书达到出神入化的美妙境界。而藏书,有这里良好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浓厚的封建宗法制度作保护。刻书与藏书本是互为因果的孪生子,刻书为藏书提供物质基础,藏书为刻书提供物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亦相反相成。

在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徽州刻书和藏书,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特点,这就是封闭和开拓、保守与进取的互相结合。说它是封闭的、保守的,可以从徽州所刻的大量的宋明理学及清代朴学著述、宗族文献、堪舆之作得到明证。说它是开拓的、进取的,可以从徽州所刻《程氏墨苑》中的西洋图画、《方輿胜略》中提及的“外夷”、开期刊先河的《朱翼》、放眼世界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郑复光的《镜镜冷痴》、杨光先的《费隐与知录》和《不得已集》,以及套版术、拱花的产生和运用等,都足以得到证明。

在历史长河中,封闭保守和开拓进取,二者并非一半对一半,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主次之分。就徽州刻书与藏书的历史而言,大体说来,明嘉靖以前以封闭保守为主,而隆庆、万历之后则以开拓进取为主,也就是这后一个时期,成为徽州刻书最辉煌的时代。然而为时不久,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特色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的刻书业逐渐走向没落和消亡。

本书的写作意图,主观上是想揭示在徽州这一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它的刻书、藏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能否如愿,只能由读者评说,我将恭听各界人士的金石良言。

研究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我也想通过对历史上的徽州刻

书、藏书的研究,能为今天黄山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找到借鉴,获取经验和教训。倘能如此,则笔者幸甚。

刘尚恒

1997年8月于津门

目 录

第一章 徽州刻书藏书的背景	(1)
第一节 徽州的自然环境与刻书藏书	(1)
第二节 徽州的人文环境与刻书藏书	(3)
第三节 徽商与刻书藏书	(6)
第二章 徽州刻书之起始与宋元刻书	(11)
第一节 徽州刻书之起始	(11)
第二节 两宋徽州刻书	(16)
第三节 元代徽州刻书	(28)
第三章 明代徽州刻书	(39)
第一节 官刻	(40)
第二节 本地私家刻书	(46)
第三节 旅外私家刻书	(63)
第四节 坊刻	(68)
第五节 社团刻书	(76)
第四章 清代徽州刻书	(89)
第一节 官刻	(90)
第二节 本地私家刻书	(94)
第三节 旅外私家刻书	(107)
第四节 坊刻	(118)
第五节 社团刻书	(123)
第五章 徽州的刻工	(135)
第一节 黄姓刻工考述	(137)
第二节 仇姓和其他姓氏刻工考述	(167)

第三节	刻工生活和技艺	(175)
第六章	徽州刻书的显著特点	(187)
第一节	种多类广,卷帙浩繁,刊刻精良	(187)
第二节	宗族文献、乡邦文献为主的地方特色	(194)
第三节	从插图本到图谱,独树一帜的徽派 版画艺术	(199)
第四节	套版术的产生和运用,带来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 第二次飞跃	(217)
第七章	宋元徽州藏书	(229)
第一节	宋元两代的公藏	(229)
第二节	两宋私家藏书	(233)
第三节	元代私家藏书	(238)
第八章	明代徽州藏书	(243)
第一节	明代公藏	(243)
第二节	明代私家藏书	(249)
第九章	清代徽州藏书	(257)
第一节	清代公藏	(257)
第二节	清代本地私家藏书	(261)
第三节	清代旅外私家藏书	(272)
第十章	徽州藏书的特点及散佚	(285)
第一节	徽州藏书的特点	(285)
第二节	徽州藏书的散佚	(293)
附录		(301)
一、徽州刻工刻书辑目		(301)
二、清代乾隆间徽州禁毁书考录		(343)
三、主要参考书目		(373)
后记		(1)
再后记		(1)

第一章 徽州刻书藏书的背景

第一节 徽州的自然环境与刻书藏书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山区,为皖、浙、赣三省接壤处,“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①,人民聚落生息在山间盆地之中。所幸的是,这个封闭的山区,东南有新安江,以通杭州;北有青弋江、水阳江,以达芜湖;西南有阊江,以抵鄱阳。唯外出则顺流而下较易,外人则逆流而上较难,且受雨水季节影响极大。境内黄山,高耸云表,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齐云山丹岩绝壁,天开神秀。这里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山区物产丰饶,景色宜人,东晋以来即成为中原士族的避世之地。

这里是一个“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典型山区,所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土地的出产不足以供民食,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之民寄命于商”^②,“百工之作皆备”^③,“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④。实力稍厚者,可以挟资四方以逐什一之利;更多的贫苦者,只能倚仗其他技艺,或在农余之暇,投入诸如制墨、造纸、刻刊诸业。歙县虬村黄姓,世业梓人,其中如黄利中、黄启高等,都是在力田之暇,习为镂工,刻印书籍,贩卖乡里,最后发展成为专事刻书的书贾,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文产物。

造纸、制墨、琢砚诸业,在徽州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虽

然山田贫瘠，却林木翳翳，盛产松、杉、柏、椿、楮等优质木材，又产桐油、生漆，地上还有包括石灰石在内的各种优质石材，这些均为徽州的造纸业、制墨业、制砚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以造纸而言，南唐时就颇负盛名，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载：“黟歙多良纸，有澄心、凝霜之号，复有长者，可五七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白薄如一。”^⑤至于制墨，自唐末河北易县李超（本姓奚）携其子廷珪避乱居徽州后，徽墨就名重一时。李氏发现“宣歙松类易水之松”，“池州九华山及宣歙诸山皆产松之所”，“西山之松与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与黄山（此指宣城之黄山）、黟山、松罗山之松，品惟上上”^⑥。再加上这里有清新隽秀的新安江水，于是，李氏父子定居下来，利用本地资源，重操制墨旧业。从此，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坚如玉、纹如犀的徽墨声誉鹊起。此后，宋之潘谷，明之程君房、方于鲁、罗龙文、吴去尘，清之曹圣臣、汪近圣、汪宣礼、胡开文（原名胡正），都是徽州的制墨名工。

徽州的纸和墨，因为质地优良，历史上一向被作为贡品，专供皇家使用，或作皇家赏赐近臣之物。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梅尧臣等，都有讴歌徽州纸墨的诗篇。

显然，徽州的自然条件，为徽州的刻书业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优厚的物质条件。

又如前所述，徽州四周群山环抱，虽有三条水系与外界相通，但滩多水湍，所谓“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滩。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即道出水路之险，且受雨水变化影响极大。若以陆上交通言，无论是从歙县老付岭（昱岭关）、箬岭或绩溪逍遥岩、丛山关、新岭出入境，还是从黟县羊栈岭、祁门大洪岭、休宁马金岭出入境，都需要翻山越岭，且多鸟栈羊道。这样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显然是险阻天成，易守而难攻。东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战乱可以说连年不

断,烽火连天,然而徽州在历史上除北宋方腊起义、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争及清末曾国藩剿灭太平军等几次战争被灾较重外,其余时期则基本上不受外面的冲击。这种相对和平安定的“世外桃源”,一方面是中原士人逃难的乐土,同时给人们读书、著书、刻书、藏书以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历史上留下来的徽州文物典籍,其数量之多,门类之繁,在全国实属罕见。

解放初期,某些人错误地把古旧书籍当作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1953年,屯溪和歙县两地的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竟达3万多斤。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比较重要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仅头4个月就收购古籍7万多册,其中有明成化刊本《沧海遗珠》、嘉靖刊本《新安大族志》、万历刊本《三关图说》,以及被列入清代禁书全毁本的明刊李卓吾《初潭集》等珍本1千多册。直至50年代末,人们从报刊上仍不断看到《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⑦、《屯溪又发现一批古籍》^⑧、《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许多图书》^⑨等报道。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旧书店,一次就选购去6700多册重要古籍。北京中国书店的老人张宗序、赵长瑞等回忆南下徽州收书时说,门外常常有许多村民挑担负籍排队送书的热闹场面^⑩。时至今日,徽州古籍已遍藏于省内外、国内外各大中型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等单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徽州历史上丰富的藏书,与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节 徽州的人文环境与刻书藏书

元代休宁学者赵汭对于徽州的人文环境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述,他说:“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

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又说:“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才,出为世用者,代有人焉。”^①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东晋、唐末、北宋末年三次战乱,迫使大量的中原士族避居这里,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徽州的经济的发展,也有力推动了徽州的文化发展。那位几乎被尊崇至仅次于孔夫子地位的朱熹,其祖籍就是徽州婺源,所谓“文公阙里”是也。朱熹又先后几度回籍省墓、游历,在这里留下朱子学的传人,形成蔚为大观的徽学,又称新安理学。其学“历元明而其传弥广”,“皆宗紫阳(朱熹)之正脉,得濂、洛之真传”^②。以休宁一县而言,宋至明代中期,就有程大昌、吴儆、程若庸、陈栌、倪士毅、朱升、赵汾、范准、汪循等九位理学名贤。这一学脉的流风所及,直至清代中期江永、戴震的朴学(考据学)之产生,走向了理学的对立面,甚至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身上,也可以找到这一学派的影子。

自唐开元年间起,徽州郡县官学开始陆续建立。北宋景德四年(1007),绩溪胡忠创办了徽州第一个私家书院——桂枝书院,此后逐渐蓬勃兴起,各类官学、书院、精舍、书堂、家塾、社学、义学遍布州县。据有人不完全统计,宋元两代徽州有各类书院32所,明代有131所,清代在沿袭前代书院之外,新创书院57所(另婺源有书院44所,属明属清待考)^③。至于社学则更多,明《(弘治)徽州府志》卷5载六邑社学470所,清《(康熙)徽州府志》卷6载六邑社学562所。各类学校林立,遍及穷乡僻壤,以致出现“十家之村,不废诵读”^④的壮观景象。

学校教育的兴旺发达,为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场所。历史上徽州人才济济,久负盛名,以至今仍具有权威性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而言,全书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多人,其中属徽州六邑的名人多达747人^⑤;宋代徽州中进士者619人^⑥;明清两代徽州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⑦;婺源一县历代进士546人^⑧;歙县仅清代就有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

传胪 5 人,会元 3 人,解元 13 人,进士 296 人,举人近千人^①;歙县一个小小的呈坎村,历史上主簿以上职务的官吏达 100 人^②。这里有历史上的宰相、部臣和州县官吏,更有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医学、天文、数学、书画、篆刻等各学科技艺的专门学者和科学家,以致这里的人们到处传颂着诸如“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③、“一科同郡两元”^④、“一门三鼎甲”、“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⑤的美谈。

人才多,著述相应地就多,官宦人员有著述,学者、文人、科学家更有著述。历史上徽州产生过多少著述呢?这实在难以统计清楚,即使以各县方志中“艺文志”所载计,也难免有遗漏。据郑惠女士的统计,不包括休宁县的徽州其他五邑历代学者达 1852 人,成书 4175 种^⑥。以囊括安徽两千年来学人和著述的《皖人书录》相比较,该书录 6000 多人,著述 17000 余种,而徽州五县著者接近三分之一,著述则超过四分之一。其他还可举出,婺源一县历代著述达 2180 部^⑦,歙县一个村落——江村,以清乾隆年间所纂修的《橙阳散志》计,著述者 78 人,著述 155 种。

著述数量如此之多,其质量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举出旁证材料:清乾隆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书籍整理,其成果结晶为《四库全书总目》。《总目》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著述为 3461 种,列为“存目”的为 6973 种,合计为 10254 种,其中安徽全省被列入《总目》的著述为 835 种,这在当时 18 个行省中,算得上可与江、浙媲美的文献之邦;而徽州六邑被列入《总目》的著述达 380 种,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著述为 150 种^⑧。

毋须多说,学校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著述宏富,为读书、著书、刻书、藏书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丰富的资源,有广阔的市场。

这里需要指出,新安理学的盛行,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的宗法制

度。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恃），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②。徽州各姓多聚族而居，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③。这种顽固的宗法制度，不仅使执刻书技艺者，父子相传，祖孙相继，世代相传，而且使后之子孙对于先人手泽遗著，设法刊刻，珍若拱璧，不敢轻易散弃，这从客观上说，对推动刻书、保护藏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徽商与刻书藏书

在徽学研究中，张海鹏先生曾指出：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徽商的‘酵母’作用，是重要的和基本的”^④。我以为，这话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很具体、很形象的。

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基本原理。徽商与徽州文化（自然包括刻书、藏书在内）的关系，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验证。

徽州的自然条件是山多田少，山区林木繁茂，经济作物丰富，而田中的粮食生产则严重不足，老百姓何以谋生呢？他们只好贩负经商，奔走四方，于是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从明代中期直至清代中期的二三百年间，徽商之鼎盛，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高峰。他们的经商范围是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尤其在沿江和江南地区，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经营的行业，尤以盐业、典当业、茶叶业、木材业为主，其中业盐为“龙头”，这也是历来各地商帮获利最厚的行业，徽州商人同样由此获利最多。明代谢肇淛指出：“富室之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又说：“新安大贾，鱼盐为

主,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③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正是包括刻书、藏书在内的徽州文化繁荣发达的坚实物质基础。

同样,由于历史造成的人文环境的缘故,被称之为“东南邹鲁”的徽州,以程朱之学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积淀很深,孔孟之道,朱子之学,在这里家弦户诵,虽深山僻壤,讽诵之声不绝。徽州人在外出经商的十二三岁之前,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读书阶段。只有在科场失意、仕途无望的情况下,“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④,或在家道中落、不得不从土地之外谋求营生的情况下,或在克绍箕裘、继续遗业的情况下,或在族人乡邻的提携等情况下,才纷纷走上经商道路。随着经商活动的需要,有的人在经商致富之后,又转向儒学,并且着意培养其子弟读书,所谓“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⑤。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是明代嘉靖年间婺源商人李大祈,其祖父、父亲业商,资雄于里,幼时父课之制科,不料父亲去逝,家道中落,以致窘不能支。于是他在“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和足以垂裕后昆”的情况下,毅然弃儒从商。发家之后,又转过来为自己置书延师,并且谆谆告诫子辈:“予身犹服贾人服,不获徼一命以光显先德,予终天不能无遗憾。然其所恃善继述、励功名、干父蛊者,将在而诸子。”时人评他“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貽谋于身后”^⑥。再一个例子就是清代黟县的胡际瑶,先世以经学传家,名儒辈出,从曾祖起,四代业商。他虽是个商人,而于诗书皆能明大义,又好吟咏、作画,善音律,并著有《浪谈斋诗稿》。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和季子习儒,仲子随他经商。他常告诫子辈:“古人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他“尚节俭,无鲜衣美食,惟从师买书之费一无所靳。过通衢见书肆,必入观书,能辨优劣,遇佳者辄购归与子”^⑦。显然,在整个封建社会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徽州商人也是深谙此理的，所以，他们常常告诫子孙：“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⑥也就是说，只有读书才能达到光宗耀祖、显赫门庭的目的。

“贾而好儒”是徽州商人的特点，而刻书与藏书可以说是“贾”和“儒”的完美结合，又可以说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和谐统一。刻书既可以赢利，又可获名，自然常是徽州商人的经营内容之一。藏书既是读书所资、学问之本，又是为刻书提供底本之必需，既是广结文人士子的必备物质条件，同时又是钱财和权势的象征。所以说，徽商的刻书、藏书，正是其“贾而好儒”特色的集中反映。

徽商的刻书与藏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由刻工起家，发展为刻书、藏书的商人，他们以射利为主要目的。如明代的黄正位、黄正达、黄正宾、黄裔我、黄德时、仇以才、仇以忠等，清代的黄启高及其子国昭、国怡、国传、国敦和黄鼎瑞、黄利中、程义等。其二是以经营其他行业为主，兼事刻书、藏书，或者说转嫁部分资金从事刻书、藏书，他们射利兼射名。如明代的汪廷讷、汪应鹏、郑思鸣、胡正言、程荣、汪士贤、黄凤池、程大约、方于鲁等，清代的项纲、程哲、鲍廷博、汪启淑、汪森、胡树声及其子胡珽等。其三主要是在“贾而好儒”的旗帜下，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收藏典籍，刊刻图书（主要为其先人、本人或友朋著述），既非营利，主观上也谈不上为传播文化计，其意在于扩大其家族和个人声望，改变商人形象，提高社会地位，显然射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如明代的黄长寿、方銮及其子方大治、吴养春、吴继仕、许文林、程元利、吴伯举、吴希元等，清代的江春和江昉兄弟、鲍志道和鲍漱芳父子、黄晟和黄履暹兄弟、巴廷梅和巴慰祖父子、汪与图 and 汪立名父子等。然而，挟资雄厚（尤其第二、三类型的商人）、所刻富且精、所藏富且精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仅名闻一地，而且名闻海内。